

# 未及题签的《编稿手记》

■ 苏华

2017年8月最后一天,我到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家协会家属院吊唁于前一天凌晨逝世的李国涛老师。一进门,师母就对我说:“你是最后一个和他聊天的。你走了之后,他还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说着您以及你们所聊天的事。因为聊得太高兴,他说,都忘了给你签名送你爱看的《编稿手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师母接着说:“他说等你下次来聊天时,再签名送你。现在他走了,你就收下这本没有签名的他的书吧……”双手捧着这本未及题签的《编稿手记》,我的眼睛顿时模糊成一片。

8月14日,一家晚报刊出韩石山致我的两通书札(经韩先生同意,该书札作为拙著读书随笔《书边芦苇》三集的“代前言”)。中午时分,我刚回到家,还没看报,就接到李老师的电话,说看到韩石山为我新出的书写的序了,非常好;又问我这两本书是不是计划中的灵石何家系列等等。具实一一回答后,我说:“听您说话声音还是这么响亮,在朋友微信圈也看到您在作协院里晒太阳,和晚辈嬉笑说话的照片,身体还健朗吧?”李老师说:“近来不行了,楼也下不了了,只能在家活动活动。”听到此,我赶紧说:“过两天我去看您。”

8月18日,我去看望李老师。一进家门,就有些伤感:他老人家何止是不能下楼,即使是在家里也坐上了轮椅,走动还要靠

助行器。落坐床边,与坐在轮椅上的李老师几可促膝后,开始了过去惯有的直接开谈。我先呈上书皮比内容好的两本小书。《书边芦苇》第三集篇首收入了状写李老师的《目倦文长存》,他边翻看边说:“这书做得好,真是漂亮——哎,你这篇文章里写了很喜欢看我的‘编稿手记’,有一段时间,还是先看我的这些小感想小文章,然后才看所记的作家作品。”我连声说:“是呢是呢。您那‘编稿手记’,我不但爱看,有些被您‘手记’了的作家,后来还和我成了烂熟的朋友。”接下来李老师问了我近期的写作情况,听了之后,他突然严肃起来,说:“你该早写李方桂!昔阳已经有了一个很出名的红色的陈永贵,再让世人知道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李方桂,岂不是两全其美?李方桂这样的大师,山西没有,全国少见,那是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学人、大师。他母亲不是你写的何家的何兆英吗?你写最合适了。”这金针度人的点拨,如果不是因为挨得太近,怕起身碰着李老师,我就差点站起来踱步了——当时我真是感慨和惊诧:他老目已倦,腿脚也不能自由走动,但关心文化走向的心却一



李国涛2014年冬在家中书房

直有着青春般的律动,一如他那杰出的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只不过,他不想让年轻人经历《世界正年轻》描写的那些事。我与李老师愉快地聊起了各自所了解的李方桂,以及其父李光宇、其祖李希莲进士的种种情事。我说:“对语言学我可是一窍不通,也不明白李方桂怎么能精通一百种以上的语言?”李老师说:“他是天才级的人物,别说你不懂,就是我也不见得懂,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懂。你若写《李方桂传》,可以简述一下他学语言和研究的方法,一章就可以了,读者对这些

纯学术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主要还是看他为何成功的策略。”谈完李方桂,我与李老师就就目下所见的人物传记进行了臧否。

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本打算再到李老师家聊天,送上上次未备好的《清代两渡何家》,并请李老师看李方桂的一些史料。30日早晨醒来,一刷微信朋友圈,《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的一条消息把我惊呆了:“今晨,我们敬爱的师长,《山西文学》原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李国涛(高岸)先生辞世,终年八十七岁。”聊天时还精神矍铄,谈锋无限呢,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我有些不相信!看到其他友人也陆续发出悼念李老师的文字,我才相信李老师真的走了。一位友人给我回信说:“李老师悄然而去,尤其在这个喧嚣的时期,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很多,一点也不打扰别人,也给自己留下了安宁的时间;生不容选择,死有时候倒是可以的;李老师临走还给你留下了一个功课,真是前辈师长。”看到友人这个回复,我伤悲的心情暂时有所缓解。

我不是李老师的亲授弟子,也没在他手下受过如何做一个正直本分的人的严威训练,但李老

师在他的晚年,对我似乎偏爱有加。记忆中,自从他在2014年“恰到好处”地宣布不再写文章了之前,只分别给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刘绪源的《今文渊源》和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写过文评。而当我和张济先生合著的长篇人物传记《何澄》出版后,从来不写应酬文章的李老师竟然接连写下三篇文章:《(何澄)有发掘历史之功》《网师园的最后主人》《一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后来我见到李老师,他还说:“我自己也奇怪,一般看着好的书,要写也就写一篇,而你和张济的书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魔,一写就写了三篇。”虽然我和张济都不是热衷出名的人,也没有一出书就找人“好评”一番的爱好,但一想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以忘怀。

从李老师家出来后,我没有乘车,而是步履有些迟缓地边回忆与李老师交游的往事边往回走。回到家后,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把李老师这本未及给我题签的书存放在何处——因我有一间书房是专存文友送我的书的,这些书全都有题签。犹豫了一阵,我把这本未及题签却比题签本更加难忘的《编稿手记》放在了床头,心里默想:就随李老师那有品格和精致的文魂,念想着他老人家对我的好,随心而读,以浸我那半生半熟的缀文,以期我那半通不通的文德有所改善。

(上接第一版)而陆文夫的《美食家》则对了崇尚美食的法国人的口味,成为畅销书,除此之外,书店再难见到其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 系统翻译当代文学的阶段

2000年以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与在法国图书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专门出版亚洲文学的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逐渐强化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不无关系。我也是在此时开始成为这家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策划的。我们调整了出版策略,按照文学出版社通常做法,走作家路线,系统地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侧重发掘作家而不是单部作品。这样做也就必然要把文学风格、想象力、故事架构、语言特色等等文学元素提到第一位,更注重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十几年过去,除了前期出版的余华、苏童、汪曾祺、李锐、王朔、孙甘露、叶兆言、韩少功、方方、卫慧等作家的作品,近十年来我们陆续推出了张宇、毕飞宇、王刚、王安忆、迟子建、梁鸿、李洱、范稳、小白、李娟、李敬泽以及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曹文轩等一批优秀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已经出版了王安忆、毕飞宇等作家的六七部作品,稳步打造作家在法国图书市场上的地位。这些文学作品进入法国主流发行渠道,在法国已然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时间证明我们选中的中国作家和作品达到的文学水准是公认的。这些作家中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毕飞宇获得亚洲布克曼文学奖和法国《世界报》文学奖,苏童、王安忆等也曾获国际布克奖提名。《长恨歌》更使得王安忆成为媒体和读者心目中上海的代言人。这套丛书的法文版也为英文版以及其他语种版本的出版作了重要铺垫,因为各国出版界不乏通晓法语的人,欧美出版社

和代理人可直接根据法语文本作出判断。毕飞宇的作品通过法语版被推向欧洲其他国家,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在欧洲的第一个外文版也是法语版,后来才有了其他语种的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成为欧美出版界了解中国文学的风向标。此外其他法国出版社也分别出版过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比如贾平凹、池莉、刘震云、格非、冯唐、张炜、阿乙等等作家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其他两家出版社分别持续出版莫言和余华的作品,使得莫言和余华成为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经过出版人这十几年一步一个脚印,有时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努力,中国文学作品不再是凤毛麟角,不再只是关心



作家王安忆(右)获得法国骑士勋章时与本文作者合影。摄影:陈贤迪。

中国的读者的圈子读物,不再只栖身于专门经营亚洲书籍的书店,而进入了普通独立书店、大连锁书店,进入了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视野。

然而,相对于引进的西方书籍,中国输出的作品体裁相对还比较单一,迄今为止,欧美图书市场上的中国书籍绝大多数是虚构文学,即中篇小说。而中国近年来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非虚构或者体裁难以界定的好作品却还未引起足够关注。这些非虚构作品有时能更直接地讲述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出中国文学家的才华。近几年我们尝试翻译出版了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还有李敬泽、周云蓬、李娟、老树等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希望不久的将来法国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另一片园地。

## 放平心态,融入世界文学

历经卅载,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融入世界文学的阶段了。一部文学作品、一位作家一旦被翻译出版,就被抛进世界文学共同体。这是荣誉也是考验。既然要走出去,那就要接受新的体系即世界文学体系的评判。西方出版人、批评家、媒体和读者会用审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不会受到特殊眷顾。哪怕是一位在中国众星捧月般的明星作家或是体制的宠儿,也不得不接受陌生读者和批评家严峻而挑剔的眼光。读者固然会根据自己对某一个国家文化的喜好相对喜欢阅读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但是最终吸引读者的还是文学文本的质量。读者对马尔克斯着迷不是因为他来自哥伦比亚,崇拜卡夫卡不是因为他来自布拉格,加缪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他来自法国。如今我们在挑选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参照谱系也不再仅仅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比如侦探悬疑或者科幻小说在中国其实刚刚起步,有些作品堪称杰作,但是到了侦探悬疑这种类型小说能占满大连锁店半层的西方国家,也许就不会那么令人惊艳。这绝不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不够好,而是因为西方这类好作品太多了。

一个作家只能代表他自己,体现的是他个人的创作实力。作家走向世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在国旗下昂首挺胸入场。一个作家在国际上被认可是因为

他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能反映共同的人性,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但这只能说明中国也有好作家,而不能说明中国文学整体比其他国家文学出类拔萃。一个在国内非常走红的作者在海外图书市场上表现平平,原因诸多,或是作品本身与其他外国文学相比未见独特,或是作品在异域水土不服,或是发行力度不够,但绝不能说是“中国文学”被冷落了。

法国加上其海外行省人口总共不到六千七百万,相当于中国湖南、安徽这样的省份,却是个开放、自由、强调个性的文学大国,图书市场上文学作品的品种比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只多不少。戴高乐曾表示有二百多种奶酪的法国难以领导。而今天有上千种奶酪的法国读者阅读品位更是众口难调。外国文学很难期待石破天惊的销售数字。中国文学进入法国就是纳入他们多元的文化体系,给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学调色板上添一抹色彩,而不可能独占鳌头。进入法国大书店,看到铺天盖地按国别、地区分类的外国文学,看到整排书架的类型文学,在这浩瀚的文学海洋里,无论是吹嘘中国文学多么畅销,还是哀叹中国文学受冷落,都只能是自取其辱。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如果不求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而是要充实世界文学,早已经走出去了。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为扶植中国文学走出去投入了大量资金,翻译出版资助名目繁多。前不久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旨在提升出版社的实力。这些都会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起到推动作用。然而文学翻译出版不是狂欢,不是一朝一夕的形象工程,更不是行政业绩。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力没有捷径可走,能做的只是保证自由的创作空间,提高作品的文学水平,严格监督翻译质量。当然还要靠出版人的眼光、耐心与恒心。